

育教學大之日明

編谷若鄭

行發局書圖華南海上

鄭若谷編

明日之大學教育

上海南華圖書局印行

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

編 者 豫 南 鄭 若 谷

發 行 者 上 海 南 華 圖 書 局

經 售 者 長 沙 鎮 江 南 華 圖 書 局 分 店

各 埠 中 華 商 務 印 書 館

明 日 之 大 學 教 育

(全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)

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七 月 出 版

章 序

經過數千年的辛勤創作，實驗，論辯，毀壞，改造，而存留積累下來的學術，至於今日，可謂極莊嚴燦爛之致了。僅爲保持這點社會的遺產，以傳於後世，已絕非個人的力量，所能希冀；惟有以集合的組織，分工做起來，才能庶幾免於文物淪亡。可是我們的責任，還不僅此。學術是活動的而不是靜止的，牠的生存，賴乎牠的改進與提高，牠的演進，就是牠的生存。這種促進學術的工作，更非個人獨力所能辦到，更要藉力於多人的組合了。在二千年前，可以出一個窮天地之奧蘊，集人文之大成的孔子，亞里士多德，在今日却無人作此夢想了。在數百年前，還有人想以「古今圖書集成」，「文獻通考」，

「四庫全書」，Encyclopedia，「類的纂述」，以永久保存學術的結晶，在今日已漸了然於這種呆板方法的效力之有限了。

要用集合的力量，有組織的分工，將這高貴的社會遺產，作活的保存，不斷的改進與提高，以增進人類的福利——這種工作，就是大學所應負起。大學的職責，如此之重，而一般現存的大學，能合乎這種工作所必需的條件嗎？大學應有的性質，一般人認識了嗎？大學的主持者認識了嗎？大學的教師與學生認識了嗎？假使我們承認現有的大學教育，離着牠應有的目標還遠，那麼大學教育的理想是什麼？在今日出版物之多，可算空前所未有了。每年新出的著作，有五六萬種之多，其中討論教育的專著，所佔的成分亦不少，然而大都以中等以下學校的問題，為討論的對象，關於大學的論著，却異常缺乏。這種

畸形的發展，是否可以證明教育學者對於大學教育之漠視，或是因爲教育學者，大都同時担任大學教授，他們只處於指導他人的地位，而無須指導自己，我們不敢斷言。但是大學教育之理論，未得充分討論，這一種缺陷，當然是無可掩飾的。

我的朋友若谷新出的這本小冊子，關於大學教育，綜合名家的論說，且冠以創論，正是現代所切要的一種書籍。內中極力提倡研究的精神，可稱時下大學教育對症的良藥。他對於大學教育的理想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學術之活的保存與演進，純恃乎研究的精神，這是無可疑問的。大學教育之成功與失敗，可以研究的精神之存在與否來判定。我們希望「研究」這兩字，可以用硃紅大字寫出，掛在每個大學校門。若谷這書竣稿的時候，要我寫一篇序，我願藉此機會，一面表

示我對於若谷理想的根本同意，一面關於這理想的實際方面，略抒己見。這也許與序的體例不合，但我想或是若谷所允許的罷。

怎樣才能研究？研究是有必需的條件的。鑽研窮究，絕非容易的事。照字面講起來，「研」是需時而要有耐性的，「究」是追根求源不知止境的。這種努力的工作，是人性本來的傾向嗎？以我們所知，人性常是向着阻力最低的方面走的，（follow 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）這是人類神經組織的特性。我們的行為如此，我們的思想亦復如此。假使一個數學問題的答案，可以從書後的Key中尋出，誰還高興用公式去演繹？雖然亦有以數學演題爲 intellectual recreation 的人，然而這只是極少數人由於特殊訓練的結果，人性的本來面目，不是如此的。我們對於宇宙裏的一切，人生裏的一切，有意識地或無意

識地早都具了固定的見解：勞心者役人、勞力者是應該役於人的；女子的智力是低於男子的；再醮的婦女是應受藐視的；遺產是只有兒子可以承繼的；國家是應有充實的武備的……我們心理中的宇宙與人生，多麼秩序井然！假如有人對我們說，我們種種觀念是錯了，再須去用理性想一想，這是多麼擾人意緒，多麼討厭啊！從自然的情性，到以反省爲習慣，以求真理爲樂趣——像 Plato 所說的 *That Dear delight*……的地步雖不是不可通之路，却亦祇有經過長時期的訓練，才能達到。

以樂觀的眼光看起來，自嬰兒的初生，他便具有好奇的天性，這就是研究的起源。教育的歷程，如不將牠摧殘，牠自能欣欣向榮地日漸滋長，成爲一切偉大發明的動力。這種說法，已成了教育裏的金科

玉律。但是人性自然的發展，果能如盧騷的預言，產生出美滿的結果嗎？兒童的好奇天性和科學的探討，不僅在程度高下上不同，而且有很多質的差別。第一，兒童的好奇，習慣的成分較少，大部是受環境的支配。凡能引起兒童注意之事物，大都有牠客觀的原因。譬如強烈的刺戟，突變的刺戟或是能夠滿足他身體需要的刺戟，都有優先的機會。他的注意，脫不了具體的平面，對於抽象的事實，物與物之關係，兒童非但茫然，亦且鮮去注意。第二，兒童注意的移動性極大，不能專注一事，逐層追求。第三，兒童對於求得的材料，不知整理，不能得着何種有系統的結論與定律。第四，兒童不能於着手之先，預立假設，以爲實證的目標。總之，兒童因爲缺乏習慣的組織，既不免常處於被支配的地位，仍然向着阻力最低的方面走；而且亦沒有研究

所必需的技能。所以要養成學術上探討的興趣，不能僅恃人類的天性，必賴乎良好的習慣；要養成學術上研究的能力，不僅須消極地保障天然好奇心的發展，更須要積極地訓練成探討的技術。這種改造天性的訓練，可以等進了大學之後才開始嗎？

研究的精神，多麼崇高而美聽啊！然而爲牠窒礙者，還不止如上所舉。高深的研究，總得有個出發的基礎。在我們一無所知的時候，當然不能研究高深的學理。我們基本的知識，何由而得呢？事事都要經過實證罷，那麼人人都須從頭做起，我們現有的學術，積了數千年的勞力而成，尙且有以有涯例無涯之嘆，畢一人的精力，所成就的是若何微細呢？若是我們接受權威的啓示罷，那麼知識的進步，固然快得多，然而接受權威便根本與研究的精神相抵觸。雖然像柏雷 Buty

所主張，凡可演證的事實，不妨根據權威，安然承受，可是人類思想中不能演證的分子儘多，我們又應如何呢？老實說，人們思想的內容，假如分析一下，裏面的成分真複雜。好如胡適之所說，其中便有許多是幼年時候從老媽子燒飯廚子口裏所聽來的格言，還有許多從家庭，鄰舍，游侶，學校，書本，報紙，戲劇抄來的藍本，更有許多成分，連來源早都忘了。經過實證的思想，能佔百分之幾？根本說來，語言便是思想，自從嬰兒在母懷裏牙牙學語，他已在那裏承受了許多觀念，理想，習尚，與價值的標準。非實証的思想，總比實證的思想來得早而且多。自由的研究，還有什麼機會？

思想之不能自由，還有一種說法：大概思想都是受一定的方式或是範疇，或是觀點所籠罩的。譬如論理裏的歸納與演繹法，便劃定了

許多人的思想程序。再如中國的冬烘老夫子，提起筆來，便是八股的老調兒。近代的思想，便處處看出進化論的影響。可見思想的內容，儘可千頭萬緒，而思想的方式常易成爲刻板。常有人說，中國人對於本國文學畧有根柢的去學外國文，後來外國文無論做得如何精通，但一望便顯出中文氣，絕充不出外國人的手筆。爲什麼整理國故，不能專靠老經師，而必須經受過新文化洗禮的人手呢？正因他的思想方式不同。然而不管是那一種頭腦，只要頭腦一經受了某種薰陶，牠便多少失去牠自由的活動了。

有人提議一條出路：權威既不能完全拒絕，我們只好把各種互相衝突的意見，臚舉駢列，作比較的研究。所謂“Where there are a thousand faiths. we are apt to become sceptical of them all”庶幾由懷

疑而虛心格物。對着許多不同的途徑，臨歧之際，轉可選擇在我。如此則最後的抉擇，正可代表我們研究的工夫。雖然我們明知道縱然利用比較的方法，實際上仍不免因個人的胃口，前時的經驗，文字的眩麗，論者的地位，等等原因，以致於各個衝突意思的力量，不能得著公允的平衡，而我們的取舍，仍不能基於內在的是非。但是唯其我們知道絕對自由的選擇是不可能，才能領會到相對自由選擇之可貴。研究的工夫，果真能用比較的方法，那麼除去實證的大道以外，也可說是雖不中不遠矣。

大凡一人的自由程度，隨他選擇機會之大小而定、在現代龐雜的人生浩瀚的學術裏，若欲隨時隨地，都用反省，非但時間精力、絕來不及，並且亦缺之基礎的材料。一個科學家，在他專長的範圍之內，

固然一以理性爲指歸，脫去了盲從之弊；然一到他學術領土之外，往往和常人一樣的易受蒙蔽。從前所謂心的鍛煉，型式的陶冶，久已被證明爲不可靠。而所謂思想的自由，又發現了一層障礙了。

上面所說，還是假定可以不受外界的纏擾；專從研究的工夫本身立論，尙且發現了許多魔障：何況外界的纏擾，是不可避免的呢？阻礙研究事業的勢力，正是多得不勝枚舉。自由研究的結果，必要引起人們對於種種制度之懷疑，而圖謀改造。所以研究實有一種化堅凝爲流動的力量。牠固然是進步的利器，可是一般社會失所憑依，惰者既厭其麻煩，怯者更頻生恐懼。至於恃現有的社會組織以保持私利的人們，更必出全力來反抗。便是那些道貌儼然，以維持文化爲己任的人，亦高架着老花眼鏡，高呼著「人心唯危」，實行他們的「穩妥而清

醒的哲學」(The safe and sane philosophy)，緘閉了大膽妄言者的口，唯恐怕「邪說橫流，斯文道喪」。文化事業操於這類人的手裏，還怕什麼思想不歸正統？其實便在革命的時期，思想亦得遵循正軌。在從前一般不知恪遵聖教的人，還不過被人定爲「攻乎異端」，擯出儒林之外。現在呢，若是因爲思想「越軌」，犯上一個「反革命」的罪名，那可又非像從前革去青衿而已了。

說到學校的自身又怎樣呢？

自動研究是需要活潑心力的。大學的學生，經過了小學而中學，十多年的冶鑄，除非天賦獨厚，一般的學生，早把活潑的心力失去了。書本中的原理，教師口授的定義，都能囫圇地吞下去，照樣地吐出來。但若遇着實際的人生問題，却簡直是莫名其妙。這種學生，習

於強記和背誦，假若一旦叫他自動去研究，他必感到異常的困難與不安。Descartes 因要脫去從耶穌會教育所受的羈絆，只好投筆從戎，許多年絕口不談學問，才能夠重新研究。一般學子，既沒有 Descartes 的天才，亦沒有 Descartes 的勇氣，只怕一經受了不良教育之毒，便永永脫不開牠的影響呢。

自動研究是需要良好指導的。試問一般的大學教師，能擔起這指導的責任嗎？我們在此處先要向全國大學教師致我們的敬意。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能力，須得一番忠實的審查。指導的工作，比拿着一冊課本，逐句解釋，或是編幾段東拚西湊的講義，或是講幾點鐘東拉西扯的「來得舊」(lecture)，要煩難得多。研究之指導者，須有廣博的根柢，專精的學識，具有傳染性的興味，而且須深明學習的歷程，頻

頻激發新的問題，指示應走的途徑，而不爲學生代步。如是的教師，在今日能尋到幾位？

自動研究是需要充實設備的。宏富的圖書，精良的儀器，完備的工作室（workshop）廣濶的博物館，以至於迅捷的舟車，以便外出考查，安全的郊野，以便觀察自然。這許多條件，在今日又能適合嗎？自動研究是需要財力與空間的。雅典之成爲文化策源地，正因人民富庶，又有一閒暇階級。在今日的中國，因爲民窮財盡，人民的心理，已陷於病態之中。愈是貧困，佔有欲愈是強烈，無論做何工作總是急於求效，先要問一問牠有無換取麵包的價值。大學的學生，在低年級的時候，固無日不羨慕那頂方帽子，及至方帽子將及於頂的時候，又愁着不能尋得優美的職業。得失之念，終日橫梗於心，那裏還